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

张宏杰新书《顽疾》出版

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反腐得失



近日,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新书《顽疾: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在这本书中,张宏杰利用掌握的文献资料,深入剖析反腐话题,对中国历史上反腐得失进行了解读。

如监察制度之所以不起作用,主要是因为皇权本身缺乏约束,“中国古代皇权大于一切,比如和珅很腐败,但因为是乾隆的宠臣,一直没有被制裁”。

在《顽疾: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》一书中,张宏杰探讨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制度性腐败的成因,他重点梳理了薪俸制度和腐败的关系,在张宏杰看来,薪俸制度和官员的清廉关系密切。“封建王朝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,用一句话总结就是‘渴马守水,饥犬护肉’。”张宏杰解释,古代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非常大,地方官员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更是有充分的自主权,但是历代中低级官员的收入水平非常低,“比如明朝知县一年薪俸才60两白银,如果完全指望薪水的话,他们的生活达不到当时的平均水平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只有极少数的官员会选择做清官,“可能只有5%性格特别耿介有追求的官员会选择做清官,因为清官的生活是非常苦的”。张宏杰以明朝官员海瑞举例说,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典型,海瑞为庆祝母亲八十大寿买了二斤肉,这一下子成了官场中的轰动新闻。

在《顽疾: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》一书中,张宏杰专门解析了赫德治理中国海关腐败的案例。晚清中国官场极度腐败,几乎无官不贪,但在一向被认为是“肥缺”的海关,却成了例外。“本来,海关是清代最腐败的衙门,在大清帝国谁都知道,当上几年海关监督,捞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。”张宏杰在书中说,到了晚清时期,中国海关却一跃成了一个著名的廉洁机构,从1861年到1908年,海关近乎杜绝了腐败,成为清朝官场唯一一块净土。张宏杰解释,海关之所以成为“净土”,与这一时期主持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密不可分。

“海瑞真的做到了只靠薪水过活。”张宏杰介绍,尽管海瑞在后来的历史上很有名,但是细读明史会发现,海瑞在任何岗位上都没有做成什么实事。张宏杰说,海瑞在当时的官场就被视为异类,他的存在让同僚觉得不自在,也没法调动同僚干事的积极性。极度清贫的海瑞甚至成了同僚眼里的“反面典型”,这也让他每到一处都会遭遇排挤,“即使升官也是被排挤的结果”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“脑洞大开”,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。1863年,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,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对中国海关的管理。上任初期,赫德对中国海关最早的记账形式进行了改革,他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账册,建立了一套“严格的、详细的和绝对可靠的”会计制度,之后又在人事、审计方面大力改革,提高腐败的惩处力度与违法成本。配合以上制度改革,赫德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。原本清代海关各级工作人员的名义工资极低,“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,但是实际上他们却个个都是超级富翁”。赫德采用高薪养廉制度使关员无后顾之忧,也不必去冒贪污的巨大风险,保证了关员们的工作热情,促使他们长期地为海关效力。

张宏杰说,由于中国古代的国家财源主要依赖农业税和人头税,只有宋朝商业税发达,官员的薪俸以及军费开支是历代帝王头疼的问题,而且随着皇权的扩张,与之相配套的整个官僚体系也迅速扩张,在主要依赖农业立国的古代,低薪制几乎成了所有王朝的必然选择。

谈到古代反腐的经验教训时,张宏杰说,如今很多人进入公务员队伍,对自己有着比较高的心理预期,“希望自己过上起码比社会平均线要好的生活。完全靠工资的话,可能只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。”张宏杰说,在这种情况下,给予与之相匹配的薪俸从而让其过上体面生活是一个方面,但与此同时,还需要其他方面相配合,“比如社会的透明程度,透明应该比高薪更重要,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反腐机构,监督要全流程,不留死角。此外,如果对公务员不减员增效,只靠高薪养廉也是不合适的”。

在普遍的低薪制下,绝大多数官员都经不住物质的诱惑。“因为他们搞点灰色收入太容易了。”张宏杰说,尽管从汉代起就建立了监察制度,明清初期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更是空前,但很多朝代依然倒在了腐败上。“朱元璋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。官员会因为收了一件衣服一双袜子被抓起来。很多地方官员都被抓光了,只好特批让官员戴着镣铐办公。”张宏杰说,即便如此,朱元璋本人对反腐从未满意过,他在任的时候,腐败压制到了比较低的程度,但是他死之后,明王朝最终也算是倒在了腐败上。“因为他没有制度上的反思能力。”

张宏杰在反思了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后认为,封建王朝的制度性腐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。比

1949年前后,一批知识精英来到了台湾,他们对台湾各方面的建设和中华文化的延续,功不可没。2010年至今,学者吴十洲多次赴台,机缘巧合地寻访了他们其中三十人的故址。以故址切入,广参史料,展开了三十位名家在台湾的奋斗和悲喜,最终成书《归去来兮: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》并于近日出版。作者吴十洲在写人记事的同时,落脚点在于强调台湾的“小地方,大文化”,即中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,视角独特而积极。

《归去来兮: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》一书所记三十人,在中国百年文化史上分量可谓不轻。像于右任、胡适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傅斯年、张大千、钱穆在两岸都有很大的影响。1949年前后,他们去了台湾,属于台湾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教育、艺术等各领域建设的奠基人之列,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“台湾奇迹”的实现。他们把中华文化带到台湾,对中华文脉的延续更是功不可没。

文人入台初期经济情况都不算好

1949年,国民党败退台湾,台湾本来面积不大,一下子涌入大量人员,社会经济压力可想而知。“早期台湾经济也不行,这些文人入台后经济情况都不算好。”吴十洲说,这些文化名人的生活水准与台湾的整体大环境紧密相关,另外,个人之间也有差别。民国大佬于右任居台后,以“每日三千字,长生一万年”的情怀大写特写行草书法作品,有求必应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元老级人物在当时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。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,人们才发现,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。吴十洲关注的人群中,黄君璧和张大千过得比较好一点,溥心畲过得恐怕比于右任、梅贻琦更加不如。溥心畲的故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,不过还有录像资料,录像中可以看到他家是一个小房子,很窄,画案就像个课桌。再者,从其地位上来说,其实也未必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样。

失利后,钱穆当年是主张蒋介石下野的人士之一。日后,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,甚至公开说,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“对国事是有利的”。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,蒋介石会见钱穆时,特地改穿长袍。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,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。1950年,钱穆在香港创办“新亚书院”,李敖从台湾政府档案中发现,是蒋介石从台湾政府的“公帑”中拿出三千元资助钱穆。1950年之后,钱穆基本每年都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,多由蒋经国作陪。1967年,钱穆公开接受蒋介石邀请,直接以“归国学人”身份进驻台湾。为此,蒋介石用“公帑”为之修建别墅“素书楼”。在台湾探访的时候,吴十洲曾在太鲁阁公路上见到过钱穆为一位“段长”题写的纪念碑的碑文。“钱穆这样一位文化大家给一位段长写碑文,我觉得这是委屈了钱穆。还有,蒋介石八十大寿的时候,钱穆有一篇贺寿的文章《‘总统’蒋公八秩华诞寿文》,其中吹捧蒋介石”。李敖后来还专门批评了钱穆的这一举动。

吴十洲说,随着台湾经济状况的好转,文化名人的生活也逐步好转。比如钱穆后期生活是比较殷实的。吴十洲在书中介绍,国民党内战

他们对台湾政治、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

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,吴十洲查阅了大量的资料,也接触到一些文人的遗孀、后人、弟子等,了解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许寿裳是同盟会元老,他坚持宣传鲁迅思想,到台湾后对鲁迅的家人仍念念不忘,还邀请鲁迅儿子周海婴赴台学习。同时,他不改嫉恶如仇本色,经常批评时政,最终在台北寓所惨遭歹徒杀害。

在探访这批文化名人的故居及遗址时,吴十洲总体的印象是“比较冷清”。“这些文人故居的保存情况各有差别。虽然我书中所述的都是文化名家了,但其故居、旧址有的保存得比较好,比如钱穆的素书楼、林语堂的有不为斋,还有一些就找不到了。”吴十洲说,消失的故居和遗址要么被商业或者其他机构所利用,要么即使开放也没有专门被开辟为纪念文化名人供人参观的纪念馆。“像梁实秋的雅舍是个社区文化中心,部分被商业机构所利用,张大千的故居,我去的时候也是需要提前很久预约,临时去是看不到的。”

“我几次去台湾探访了一些文化名人的故居、遗址等,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源于实地考察的感受。”吴十洲说,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,之后成为令人瞩目的“亚洲四小龙”,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,但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,去台知识分子在推动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,“不只是经济复兴,在政治、文化等其他方面,这批知识分子对当下台湾都有很深的影响”。吴十洲对这批学者去台的命运产生了好奇。

1949年后去台的文化名人,在大陆多数也有故居、旧址,有的还不止一处。在写书的过程中吴十洲经常会想,现在大陆去台湾旅游的人越来越多,但对这些故居有了解的人并不多,“两岸的名人故居是否能联合起来办一些纪念活动?”(综合澎湃新闻等)

《归去来兮》出版 1949年去台湾的文化名家,他们过得怎么样



《归去来兮》 吴十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: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:曲鹏
美编:牛长婧